

二、永恆的鄉愁——曾經有個國家，叫作南斯拉夫

1. 【巴爾幹壞男孩的鄉愁與夢魘】

導言：2015年是前南斯拉夫內戰結束二十週年，這場二戰後歐洲土地最嚴重的戰爭帶走超過十四萬人的生命，近四百萬人流離失所。在戰後二十年的此刻，除關注當年「受害者」的經歷與處境，我更深入長期有著「加害者」刻板印象的塞爾維亞，聆聽當地人們的聲音、追索複雜的歷史脈絡，嘗試撥開誤解的迷霧，期望以更人性的態度，理解從衝突到後衝突社會的歷程。

主文：

白色大理石棺上蓋滿花束，周遭圍繞綠色植栽，溫暖明亮的陽光從透明玻璃屋頂撒下，不分男女老幼職業性別，人們的眼神定定向前，篤定如凝視應許之地，出神如遙望烏有之鄉。

最醒目的是盛裝的孩子，從幼童到少年，一身共產時代「少年先鋒隊」的標準裝束：天藍色船形帽前有著耀眼紅星，脖子繫上紅色領巾，跟著母親來向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度致敬。

這個國度已隨統治它的強人鐵托（Josip Broz Tito），一同埋葬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Belgrade）市郊的陵墓「花之屋」。儘管今天的少年未曾經歷過那個時代，但在長輩的追憶中，他們會知道那是所可能擁有最好的時光。

隨著冷戰終結，鐵幕瓦解，實驗失敗的共產主義被棄如敝屣，但在歐洲東南一隅的巴爾幹半島，人們持續從四面八方來到鐵托墓前，悼念這位共產時代的領袖，悼念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南斯拉夫，幾乎像是一種朝聖。

●最好的時光

「想到南斯拉夫，我想到小時候每年夏天去克羅埃西亞的海邊度假，也想到在司普利特（Split）、扎格拉布（Zagreb）的童年好友，還有去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玩時，吃的土耳其傳統甜食果仁蜜餅（Baklava）。」貝爾格勒大學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阿札罕默（Vladimir Ajzenhamer）說著，滿載鮮明、快樂的回憶，就像被完整呵護的幸福童年，沒有仇恨與傷害，成人的世界還很遙遠。

阿札罕默小時候的南斯拉夫，曾經是一個同中有異又彼此和諧共存的奇妙統一體：由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斯洛維尼亞、蒙地內哥羅、馬其頓六個共和國，加上伏伊伏丁那、科索沃兩個自治省組成。境內包含三種宗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三類人種（南方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二套文字系統（西里爾字母、拉丁字母），看似相斥的脈絡交雜，卻又像斑斕織錦，映照出多元豐富的文化色彩。

當鐵托領導的共黨游擊隊贏得二戰勝利，在巴爾幹半島成立一個以斯拉夫人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度後，他即有意識淡化、消弭各種內在差異，在「兄弟情與共同體」（Brotherhood and Unity）的大纛底下，強調南斯拉夫的集體認同。

對外，他則不像其他共產國家跟在蘇聯老大哥後頭，大膽地在1948年向史達林說「不」，走自己的路。積極聯合美蘇兩大強權之外的世界各國，倡導「不結盟運動」，與歐、亞、非等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冷戰對峙時期掌握微妙的權力平衡，贏得世界各國領袖的信任與

敬重。除了少數如美國、瑞士等國，那個時代的南斯拉夫國民不用簽證就能到世界各國旅行，南斯拉夫護照在黑市喊價超過一萬美元。

生於1977年的阿札罕默還記得，從小在學校裡就被灌輸鐵托的偶像崇拜，老師會叫同學們排排站好，當問到誰是你最敬愛的人，沒有例外，每個人的第一順位都是鐵托，接下來才是爸媽。這樣的敬愛，沒有隨著強人去世、強權瓦解而消失，而是日益提高，恐怕是舉世無雙的例子了。

「花之屋」陵墓外有一棟展覽館，我造訪的時間正巧碰上新一檔展覽開幕，主題是關於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時期的現代化發展，從工業發展、教育制度、室內設計、社會福利、觀光旅遊、流行時尚……幾乎無所不包地重現共產時代各方面的生活面貌，展覽名稱「他們從沒擁有過這麼好的？」（They Never Had it Better?）問號後面的答案是什麼，幾乎不言而喻。

「毫無疑問那是一黨專政的極權時代，但是社會卻相對自由。」阿札罕默強調，「即使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也會說鐵托的時代比現在好得多。那時有非常好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薪水與退休金都很理想；文化多元，我們可以看各國的電影、喝可樂、出國旅行、聽世界各地的音樂。對其他共產世界的民眾而言，這簡直難以想像。」

●轟炸遺痕

從「花之屋」回到貝爾格勒市區，卻像被拉回苦澀的現實。北約當年轟炸塞爾維亞國防部的殘破廢墟多年後依然矗立，裸露扭曲的鋼筋水泥與焦黑牆面彷彿提醒全世界：瞧，我們也是受害者啊！

在郊區的新貝爾格勒（Novi Beograd），一片偌大草皮外解說牌的西里爾字母底下，以簡體中文寫到：「僅此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塞爾維亞共和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刻給予的支持和友誼，並僅此緬懷罹難烈士。」當年美軍轟炸機的炸彈落進位在此地的中國大使館，三名中國記者當場死亡。

1999年北約空襲塞爾維亞的遺痕，仍鮮明鑲刻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此一「人道介入」是冷戰後北約第二次大規模軍事行動，1995年的第一次，也跟塞爾維亞有關，針對的是波士尼亞境內的塞軍，而當炸彈掉進塞爾維亞本土，終迫使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結束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

戰火在最後才延燒到最南端的科索沃，卻早在南斯拉夫解體前夕，就成為騷亂與衝突的關鍵。科索沃雖然不是共和國之一，卻高度自治，擁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可以與其他國家簽署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甚至有權力否決中央政府的決策。當鐵托逝世，權力真空之際，米洛塞維奇藉由激化科索沃少數塞爾維亞裔與多數阿爾巴尼亞裔間的矛盾（前者佔總人口85%，後者8%），擴散極端的民族主義。

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被取消，行政當局全數由塞爾維亞人取代，官方語言也從阿爾巴尼亞語換成塞爾維亞語。像連鎖反應一般，此舉牽動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不安，在「大塞爾維亞」的威脅下紛紛尋求獨立，可說是引爆1990年代內戰的導火線。直到90年代後半，戰火蔓延到科索沃時，發生在波士尼亞穆斯林身上的種種災難，像是歷史重現般，再度使數十萬阿爾巴尼亞人被塞爾維亞軍隊屠殺、驅趕、流離失所。

●為何是科索沃？

科索沃之於塞爾維亞人，就如同耶路撒冷之於以色列人，是他們對歷史的自豪、對精神的追求、對犧牲奉獻的使命等種種近乎執念的根由。中世紀塞爾維亞王朝的黃金時代根植於此，位在科索沃西北方佩奇（Pec）的古老教堂至今仍是塞爾維亞東正教的信仰中心。

「中世紀的科索沃戰役是塞爾維亞民族認同的核心，關於那場戰役的歌曲到現在仍不停在民間傳唱。」塞爾維亞傳統女歌手史芭季奇（Svetlana Spajic）說，她從二十年前就開始在鄉間跟著老學習傳統歌曲，如今已是世界音樂領域中重要的音樂家，並曾與大師級的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合作，「最純粹的傳統裡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必參雜任何現代元素，就能令今日的聽眾感到前衛而震撼。」她說。

1389年慘烈的科索沃戰役中，塞爾維亞王國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全數殲滅，黃金歲月就此一去不回。只是這場慘敗對塞爾維亞人而言，卻是史詩性的壯舉，代表這個民族為了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站在最前線，對抗來犯的土耳其人異教徒，並犧牲了自己。

當年的古戰場，現今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Pristina）近郊，豎立了一座巨大的紀念塔，上面刻著統治者拉扎爾（Lazar）大公在戰役前發出的詛咒：「凡流著塞爾維亞血液的人，若不到科索沃戰場作戰，將永無子嗣……」

這個深埋在歷史底層的誓言從來沒有被遺忘，五百年過去，在南斯拉夫最後歲月的1989年，米洛塞維奇在同一個地點發表了激昂的演講，用這場飽含恥辱、犧牲、復仇的戰役，引出的國仇家恨，注入往後長達十年的動盪歲月。只是當砲火止息，萬惡的「巴爾幹屠夫」米洛塞維奇被國際法庭緝捕並在羈押中猝逝，2008年科索沃宣布獨立後，這片土地已永遠不屬於塞族。

「這純粹的精神力量被政治狂人濫用，煽動仇恨意識，已成為難以洗脫的汙點。在1990年代成長的孩子聽到科索沃，永遠是一連串問題，很多人只想揮去這重擔往前走，這很悲哀，不了解自己的根源，怎麼長成枝葉繁茂的樹？」史芭季奇感嘆。

對於許多塞爾維亞人而言，科索沃仍是最重要的精神原鄉。北部米特羅維察（Mitrovica）一帶，仍有部分塞族人聚居，街頭塗鴉到處都是大大的1389字樣與中世紀戰士如天使的身影，當地人以這個塞族群心中永遠的痛與驕傲，來宣示死守「自己」土地的決心。

至今塞爾維亞仍不承認科索沃的獨立地位，但形勢比人強，兩國近年來因「胡蘿蔔」——加入歐盟大家庭的前景，逐漸改善往昔水火不容的緊張關係。在歐盟調停下，於2015年8月簽署雙邊關係正常化協議，各自在部分妥協中拿取所需，例如讓北部的少數塞族能有一定程度自治並接受來自貝爾格勒的資金，而科索沃則終於有了自己的國碼383。（在仍屬自治省時，要打到科索沃必須撥塞爾維亞國碼381，獨立後由於仍未被許多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等有分離勢力的國家承認，也非聯合國成員，長期沒有國碼，必須租用摩納哥的國際碼377。）

但由於波士尼亞在戰後被劃出塞族共和國的殷鑑不遠，愈來愈多的阿爾巴尼亞人認為，龐大的外力介入使科索沃遲遲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最大的反對黨「自決」

(Vetëvendosje) 成員多次在議會丟擲催淚彈，以激烈手法抗議與杯葛議事進行，使這個在南蘇丹之後世界上第二年輕的國家，在2015年後半屢屢躍上國際新聞版面。

這個巴爾幹一隅的未來猶被煙幕籠罩，前方持續傳來不穩定的刺鼻煙硝。

●無法告別的記憶

塞爾維亞友人艾莉克斯在東正教復活節的日子，邀我到家裡作客，公寓旁即是當年被炸的中國大使館的空白遺址。一進門，典型塞爾維亞人的熱情迎來：除了斯拉夫民族傳統待客之道的麵包與鹽，還有一大瓶用梨子自釀的白蘭地，超過40度的酒精與貝爾格勒那一年的五月熱浪在體內流竄。漲紅的臉與涔涔汗珠中，我和艾莉克斯及她的母親一起染著彩蛋，並按照習俗挑出一顆放在家裡，而從去年復活節放了一年的「舊彩蛋」則準備功成身退丟入河裡，象徵年復一年的新生。

當艾莉克斯的先生伊果從工作的餐廳輪完班回到家，我即隨著他的腳步，來到附近河岸，看著他親吻這顆承載了過去一年祝福與幸運的彩蛋，接著拋入平靜的多瑙河。那揮手的姿態，既像告別過去，又像迎接未來。

在走去河岸的路上，以及飯後在陽台的談天中，無意間，我聽見他異常沉重的故事。過去的夢魘糾纏不去，難以告別。

「天大的謊言在這裡。」話語像是千斤重的石塊，艱難地從他的口中吐出，並要藉由不住的嘆息，才能繼續。「過去二十年發生的事，你應該也知道到了，許多我們的人都被送上ICTY（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許多的謊言、謊言、謊言……，除了政治操弄，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非常噁心。」伊果斷斷續續說著。

「你聽過『斯雷布尼查』（Srebrenica）吧，當年我就在那裡，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那是戰爭，不是『種族滅絕』（Genocide）！」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伊果是塞爾維亞軍官，按照現在的西方定論，當年他就是「斯雷布尼查大屠殺」加害的一方。「我知道我沒有殺任何老人、小孩，或犯下任何戰爭罪行。」伊果強調。

1995年發生在波士尼亞東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是強調人權的西方世界永恆的汙點，沒有人能相信二十世紀末的歐洲一隅，在短短一週之內，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從世界上消失，且並非像當年納粹大規模有系統地用毒氣「解決」，而是以刀槍炮彈等原始方式殺戮。而當時斯雷布雷尼察才剛被聯合國定為「安全區」，禁止交戰或使用武器。這個南斯拉夫解體後最血腥的一刻，現在被定性為二戰後歐洲最嚴重的「種族滅絕」。

儘管塞爾維亞總統尼科里奇(Tomislav Nikolic)於2013年4月接受波士尼亞電視台專訪時，破天荒以極低姿態表示要「跪下來為塞爾維亞人在斯雷布尼查犯下的戰爭罪行致歉」；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在2015年更兩度親赴斯雷布尼查的紀念墓園向罹難者致意，他們卻始終堅拒承認那是「種族滅絕」。

「當時兩邊都持續互相攻擊，波士尼亞部隊在之前，就已經對塞族人的村落發動多起突襲，屠殺許多村民，我到過現場，無法形容在那邊看到的慘況……至死都忘不掉。」伊果痛苦地回憶著。「我們後來包圍了波士尼亞軍隊，跟他們說：放下武器，舉白旗投降，沒有人會死。他們舉了白旗，一個半小時之後卻又突圍，試問，我軍該怎麼反應？《日內瓦公約》36

條規定：若一方舉白旗投降後又再動武，另一方可毫不手軟還擊。」當時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大批波士尼亞軍隊突圍的方向，是遠在八十公里外，由波士尼亞政府掌控的圖茲拉(Tuzla)，而彼時這麼這一大段距離布滿了塞軍砲火以及地雷，絕對不可能毫髮無傷的穿越，於是就產生大規模死傷。

●力抗國際指控的民族

「這是公平的戰爭，不是種族滅絕！」伊果一再堅定地重複說道，「『種族滅絕』的定義是什麼？系統性、有計畫、有組織地消滅整個人口，不分男女老幼。而都已先讓所有的婦女與小孩搭上巴士，去到自己決定的地方，全部存活，如何能叫做種族滅絕？」他強調。「戰後我跟我的同僚談過，瞭解到確實有五到六百名波士尼亞克男性被俘虜後處決，這是戰爭罪行沒錯，但並非『八千』這個數字。會發生處決背後的原因，跟這片土地前幾個世代沒有平復的仇恨有關。」他補充道。

塞爾維亞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國際法庭及背後所代表的歐美政治勢力，直到現在都對他們充滿不公與偏見。當年北約部隊在現場袖手旁觀，遲遲不敢介入，無能阻止慘劇發生，為此西方長期感到良心不安，塞爾維亞理所當然成為必須嚴懲的對象。

另一方面，塞爾維亞也積極利用各種機會，在國際上為自己的立場發聲。當塞爾維亞外交官耶利米契(Vuk Jeremic)擔任聯合國大會主席時，他即利用職權之便在聯合國舉辦論壇，討論國際法庭在處理前南斯拉夫內戰問題的公正性，此舉引來波士尼亞戰爭受害者家屬協會的強烈抗議，美國、加拿大、約旦等國甚至拒絕派代表出席，認為這又是塞爾維亞當局推卸歷史責任的舉動。

2015年聯合國為紀念斯雷布尼查大屠殺二十週年，在紀念活動前夕提出「種族滅絕」決議，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動用否決權後，尼科里奇肯定忠實友邦俄羅斯此舉，「沒有讓全塞爾維亞民族被污名化為種族滅絕的兇手」。

「我無法瞭解為何每個政客、每個人都要導向戰爭罪與種族清洗？每個生命都是美好、可貴的，但如果有人要攻擊我的國家，我會是第一個拿起槍保家衛國的人，這是我對國家及同胞的責任！在巴爾幹我們有一句諺語：『如果他有槍，我也有槍，我最好在他射我之前先開槍。』」在伊果激越與痛苦的語氣中，戰爭創傷血淋淋地袒露在我眼前。

誰是加害者？誰又是受害者？那原先清楚、不容質疑的二分法：塞爾維亞即等於屠夫／波士尼亞穆斯林即等於受害者，已被重重搖撼。

「毫無疑問的，戰爭非常骯髒，特別是當軍靴穿在你腳上已經六七年後，你會開始想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我『不想』後悔，如我所說，若你住在一個國家，你有你的權利，也有對國家的義務……許多人沒有辦法接受外界對塞族犯下戰爭罪行的指控，因為如果要這麼想，等於承認罪犯就在我們之中，這令人無法接受。」當伊果仍繼續在陽台上，蹙眉嘆氣地向我吐露這些縈繞不去的記憶，艾莉克斯來到我們中間，在理解的眼神中示意可以到此為止了，接著用手輕撫他的額頭，像在安撫一個受傷的小男孩。

●歷史還魂

伊果口中「這片土地前幾個世代沒有平復的仇恨」，是理解二十世紀末發生在這裡一切的關鍵。南斯拉夫這個曾經看似和諧的大家庭到了分家的時刻，人們何以深仇大恨非要置人於死不可？光是科索沃與塞爾維亞的問題，還不足以解釋那幾乎全面性的族群衝突風暴。

當鐵托領導的共黨解放軍贏得二戰勝利，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誕生後，「游擊隊戰士」比宗教還神聖，與「反法西斯」的金科玉律一同攜手，「二位一體」護持著強人的國度。此前的一切就此被當作不曾發生一般，被一黨獨大的歷史消抹掉。

夾處在東方的鄂圖曼土耳其與西方的奧匈帝國邊陲，巴爾幹半島雖然在鐵托的意志與個人魅力下成為冷戰時期的「緩衝區」，但深埋底層的「火藥庫」陰影揮之不去。1914年奧匈帝國國王儲於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遇刺，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時的巴爾幹更被各股交雜勢力撕裂。

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南斯拉夫王國（一戰後成立的皇室政權，與共產時代的南斯拉夫無關）後，扶植克羅埃西亞成立法西斯政權「烏斯塔沙」（Ustasha），將成千上萬塞爾維亞人抓進集中營殘酷的處決；而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及保皇黨人成立的南斯拉夫祖國軍「切特尼克」（Chetniks）與納粹展開抵抗，與此同時，鐵托領導的共產游擊隊也參與戰鬥，但兩者之間又發生內鬥；共黨勝利後，切特尼克部眾被監禁及處決，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在共產時代長期被禁絕，幾乎銷聲匿跡；二戰時的穆斯林則分散在不同陣營，甚至有一支納粹親衛隊漢扎分隊（Handzar division），對塞爾維亞人進行殺戮。

1990年代的內戰，幾乎讓人似曾相識地想起二次大戰在此發生的一團混戰。五百年前都是一家親的南方斯拉夫人，把歷史名詞當作標籤，粗暴、簡化地貼在不同陣營之間：塞爾維亞是有著骷髏頭的「切特尼克」、克羅埃西亞是納粹同流者「烏斯塔沙」，波士尼亞更被輕蔑地稱為「土耳其人」，直接指稱他們在鄂圖曼土耳其統治期間改宗伊斯蘭教，傾向統治者的事實。

烏斯塔沙（以及被視為狼狽為奸的波士尼亞克人）迫害塞爾維亞人的歷史，以及在鐵托時代被壓抑的民族主義，在表面的和平與融洽之下，並未被遺忘。

「回到自己的家裡，長輩常告訴下一代，你的祖父、父親或叔叔就是當年被某某人殺害的，而那些人，還住在你家對面，如常生活著。甚至可回溯到幾百年前土耳其統治的時代，數世紀以來累積的仇恨記憶，很難用任何方式化解。『有人某天要為此付出代價』，這樣的潛意識已存在一般人心中。」阿扎罕默說。

除此內部深埋已久的糾葛，外部因素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沒有缺席，「克羅埃西亞一宣布獨立後，德國因想成為歐洲主導勢力，馬上第一時間承認，完全不留一點時間與空間，給各方之間有彼此斡旋、討論的空間，於是問題就跑出來了，那些住在克國的塞族人，不甘心就此成為少數民族，在塞爾維亞政府火上加油下，遂一發不可收拾的走向戰爭。」阿扎罕默提到，「輪到波士尼亞時，當地人其實試圖努力避免衝突，因為他們知道若發生的話，會加倍血腥混亂。」

在沒有一個人數占優勢的主導族群的情況下，戰爭果然在此地持續最久，留下的傷痕也最深。用歷史的舊恨號召，還魂為新仇，或許不是頭一遭，但加諸在巴爾幹人民身上的一切，說明了當過去的冤魂還沒有被平息時，某一天反撲的力道會是多麼駭人。

●以遺忘為代價

「我這一代多數人打從心底相信，可以靠著遺忘與服從，換取他們所認為的美好生活……包含我在內，無人預測、防止，甚至反抗目前發生的戰爭……」斯拉汶卡·德古麗琪

(Slavenka Drakulic) 在〈我父親的罪惡〉這篇文章中寫到，此文收在《歐洲咖啡館：尋找自我的東歐世界》(Café Europa: Life After Communism) 一書，出版於前南斯拉夫戰事方休，正式分裂成各個「民族國家」的時刻，可說是對這場二戰後發生在歐洲土地上最嚴重戰爭的註腳。

我們在克羅埃西亞首都札格拉布 (Zagreb) 的咖啡館碰面時，她正從僑居的奧地利回到故鄉小住。德古麗琪是克羅埃西亞在英語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從1980年代開始擔任記者時就勇於針砭時弊，擅於描繪後共產社會人心與現實狀態，後聚焦書寫19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相關主題，並因此遭受人身財產威脅，選擇離開祖國。

對於完整經歷共產時代的她而言，歷史意味著兩個版本，學校裡偉大的戰爭傳奇，和家裡不經意閃現的殘影：祖母回憶隨共黨游擊隊洗衣做飯的日子，剛收復被切特尼克劫掠的村莊，聞到屋裡飄散的食物氣息，打開爐子上的鍋蓋一看，裡頭是像烤小豬一樣的嬰孩；或者是偶然翻到陳舊書頁，泛黃的黑白照片上是堆積如山的屍體，直到長大後參觀了「亞森諾維奇」(Jasenovac) 博物館，她才想起小時候可怕的圖輯書名，就是此地，烏斯塔沙在亞森諾維奇集中營處決了七萬名塞爾維亞人、吉普賽人、吉普賽人、共產黨徒。

「當一個社會沒有集體的歷史事實，而只是個別、片斷的回憶與印象，人們便很難抵抗有心的政客藉此渲染、攪動情緒，人們薄弱理性輕易崩壞。」德古麗琪說。「我的女兒那一代上了戰場，為了袖手旁觀的我們這一代，犧牲在不屬於他們的仇恨中。」她感嘆道。

生於1949年的她身為戰後嬰兒潮世代，享有南斯拉夫最平穩的一段歲月，卻是以遺忘歷史為代價，她曾為游擊戰士的沈默父親從未說過二戰往事；而當共產體制崩解之時，又是第二度的遺忘，歷史從1990年開始重寫，往昔的社會主義成了人人摒斥的過街老鼠；到了前南斯拉夫內戰好不容易結束時，人們基本上已疲乏到不想談論任何戰爭議題，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同樣的沈默、同樣缺少對真相的追索、同樣的操弄現實。」她如此形容從二戰、1990年代內戰至今的社會氛圍。或許是源於整個世代袖手旁觀的罪愆感，1990年代的戰爭爆發初期，她便投入所有精力報導、剖析相關議題，戰後更著手描寫那些被形容成怪物的「加害者」。

「犯下可怕罪行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瘋子，與生俱來殺戮的本性，我認為這是一種心理防衛，使人們不要去相信他們事實上只是『普通人』。」她提到。在準備寫作的過程中，她親赴位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從2000年秋天待到2001年初共五個月的時間裡，每天到法院聆聽審理程序、觀察這些戰犯，並調閱公開檔案，由此選擇數個案例，用生動的文學筆觸賦予角色血肉，而非只是新聞裡罪大惡極的殺人兇手。她以說故事的手法傳達出，當戰爭爆發，第一批上戰場殺戮的通常是罪犯，但所佔比例其實很小，大部份就只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人。

「我們能夠想像，被判刑或被關押的『壞人』樂於報復這個世界，但要如何相信，昔日鄰人眼中的好好先生一夕之間變成殺人如麻的惡魔？當大部分人發現必需決定向左或向右走時，環境時常決定了人們的行為。」她說。「從寫作這本書中，我得出一個非常黑暗的結論：所有的人類，包括你跟我，都有行善跟作惡的潛能，我們不能保證，在特定情況下會如何反應。許多人會說，『喔，我連一隻蒼蠅都不敢殺』，但你永遠不知道，你能做出什麼。」她總結道。

這本少數剖析戰爭「加害者」的書名就叫做《他們甚至不會傷害一隻蒼蠅：海牙法庭中的戰犯》（*They Would Never Hurt a Fly: War Criminals on Trial in the Hague*）。其中的觀點重新定義了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元對立，進入加害者不常為人所知的生活片段，以同情地理解，敘述出他們曾與你我無異的生命，如何被扭曲，走向不可挽回的毀滅，更加凸顯戰爭的無意義。

●事實的力量

無可諱言的，作為發動大多數戰事的一方，戰後塞爾維亞的名聲一落千丈，「巴爾幹壞男孩」的刻板印象如影隨形。「關於巴爾幹戰爭的唯一真相是，所有人都對別人幹下可怕的事，沒有人是純潔無辜的受害者。不巧的是，塞爾維亞人永遠被認為要負最多責任、承擔最多罪惡，我們覺得很無奈也很不公平。但有時這種負面形象也是種優勢，比如到西歐時，人家聽到你是塞爾維亞人，立刻反應就是倒抽一口冷氣悄聲說，『哇，不好惹的來了！』」符拉迪米爾自嘲地說道。

雖然塞國主流論述對於戰後被國際社會貼上的標籤充滿不平，但仍有一些人持續追求真相與公義，在這個普遍被視為「加害者」的國度，為受害者爭取權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團體非人權法律中心HLC（Humanitarian Law Center）莫屬。

HTL由塞爾維亞人權工作者納塔莎·康迪琪（Nataša Kandić）成立於1992年，在戰後無所不在的威脅與壓力下，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成就是公布塞軍處決六名波士尼亞穆斯林的錄影畫面，並作為證據呈送國際法庭，因為畫面太過直接、無可迴避，使人親眼目睹斯雷布尼查大屠殺真實情景，同時讓塞爾維亞國內輿論也從拒不承認開始轉向。

在科索沃戰爭結束之後，HLC透過蒐集事實資料，定期發表白皮書追究戰爭罪行的責任歸屬。「以犯下最多戰爭罪的549旅檔案（Dossier: 549th Motorized Brigade of Yugoslav Army）為例，我們從ICTY國際法庭的網站上找到戰後強制移交的軍事資料，重建當年軍隊駐紮之地，同時蒐集倖存者、居民與士兵的證詞，在不同素材間交叉比對，從而推導出該村落遭到塞軍『清洗』的結論。」HLC現任總監珊卓·歐洛維琪（Sandra Orlović）說。

顧名思義，從「法律」的角度追求戰後正義，幫助那些被剝奪權益、不被承認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在法庭上協助他們打賠償官司，是HLC的重點工作。從2003年以後，戰爭罪行法庭已由荷蘭海牙移轉到前南斯拉夫諸國，但從克羅埃西亞到塞爾維亞，其司法公正獨立性都備受質疑，戰後分裂至今，民族本位的政治桎梏仍瀰漫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除了追究加害者的責任，重建關於受難者的記憶是HLC另一個重點工作。「科索沃記憶之書」蒐集了約30500位罹難者的資訊，包括家庭背景、實際遇難狀況等，讓他們能「活著」，而非只是統計數字，使未來的人們可更容易理解那段歷史。它也象徵一種蒐集事實的方法學，累積的資料在未來可成為追究加害者責任歸屬的基礎。

因著戰後需面對的相似處境，從2008年開始以HLC為首，巴爾幹諸國的NGO團體展開區域合作的聯合倡議，要求由各國官方出面支持成立跨區域的「真相委員會」，超越各自民族本位，建立對話機制，朝向未來的和解之路邁進。目前已有1500個單位加入此一名為RECOM的區域合作計畫，各國總統均對所提出的草案表示開放的態度，研擬納入政府層級。

從1990年代戰火正熾到21世紀的現在，HLC匯聚了幾代人對公理與正義的信念，而如同大多數此類團體，他們的經費大多來自歐美國家的捐助，往往成為被指控與汙名化的口實，「叛國賊」只是最輕微的指控。

「當自己的國家政府不支持我們的工作，又能如何呢？我們不期待所倡導的價值被大眾接納，特別塞爾維亞背負著以國家之名犯下的許多罪行，人們無法接受，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是很大的考驗。但與十年前無人承認相較，至今連最民粹的政客都為戰爭罪行道歉，雖然說一套做一套是另一回事，但這至少證明，事實的力量無可辯駁，主流社會也慢慢改變，討論塞國犯下的罪不再是禁忌。」歐洛維琪表示。

2. 【驕傲與重擔】

告別漫長的冬日，初春的貝爾格勒洋溢著歡樂的節慶氛圍，人們悠閒地在街道上與公園內漫步，坐在戶外喝咖啡談天說地，又適逢五月第一個周日是東正教復活節，有長長的連續假期，許多人出城野餐郊遊，或者到山間海邊度假。

而對另一些人而言，這段日子除了是調劑身心的休假，更是重要的朝聖之日，朝向賽爾維亞人信仰的聖地：科索沃的佩奇(Peć)。

「小時候我常去佩奇，但後來戰爭爆發就此無緣重返，直到去年因研討會的機緣才在戰後第一度踏上，心情非常複雜。回到過去是你國家的一部分，現在當地的阿爾巴尼亞人卻以非常不友善的眼光望著你，感覺實在無比奇怪。」阿扎漢默打包好行李，準備和朋友開車到佩奇度過復活節。

儘管不會是段輕鬆的旅程，但對阿扎漢默來說，「那是賽爾維亞中世紀歷史的一部分，是我們精神文化的搖籃，當你真正在裡面時，你才能知道自己是誰。」

●瀕危的聖地

「這裡對賽爾維亞東正教的意義，就像梵諦岡之於天主教。」佩奇教區的約凡主教(Bishop Jovan Culibrk)說。中世紀賽爾維亞王朝的黃金時代根植於科索沃，而從十三世紀開始，佩奇就是最高領袖牧首的所在地，賽爾維亞東正教現任牧首愛任紐(Patriarch Irinej of Serbia)二〇一〇年上任時，仍然在此登基。

只是登基後，牧首並不會留下來，而是回到貝爾格勒，儘管是信仰精神的原鄉，實際上這片土地已不再屬於賽爾維亞人。「非常悲哀的事實是：佩奇這整座城市過去曾經有一萬五千名賽爾維亞居民，如今只剩下八人。」約凡主教說。

一九九九年北約介入，大舉轟炸賽爾維亞後，粉碎了米洛塞維奇最後的「大賽爾維亞」野心，終結科索沃戰爭。之前被賽爾維亞軍隊驅離的阿爾巴尼亞人，在美國及北約協助下回到家園，最終於二〇〇八年宣布獨立。換成住在科索沃的賽爾維亞人節節敗退，原本居於科索沃的四十萬名賽爾維亞人，已有二十六萬被迫離開，而在歷年來間歇的族群衝突中，無數間教堂遭到焚毀破壞，包括神聖的佩奇教區。

「在前南斯拉夫時代，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發起要求自治權的大規模抗議時，教堂就在一九八一年被燒毀，二〇〇四年又在全國性的動亂中遭到破壞。」約凡主教說。而這些衝突都並非近代的新鮮事，而是持續不斷的多舛歷史。「你看到院區中央的石頭殘跡嗎？那是十四世紀末土耳其軍隊劫掠過的痕跡，後來奧匈帝國的軍隊還曾將教堂當成馬廄使用，許多十三世紀的壁畫直到二〇〇六才修復完成。」佩奇教區已被特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瀕危世界遺產」。

戒備森嚴的大門口停放著一輛裝甲車，還有沙包築起的掩護工事，得小心翼翼將護照交給站哨的北約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士兵，換證後方得進入參觀。「近年來局勢已經平靜很多，我們在這裡不止為賽爾維亞人守護精神聖地，也是為全人類文明。」約凡主教帶著僅存的幾位神職人員、修女，孤獨地在飄搖風雨中燃亮這個民族的光。

●民族的驕傲與重擔

要瞭解這個民族，以及他們在巴爾幹複雜的分合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或許得先瞭解他們對歷史的自豪、對精神的追求、對犧牲奉獻的使命等種種近乎執念的深層意識，到底從何而來。

「當年的科索沃戰役是賽爾維亞民族認同的核心，關於那場戰役的歌曲到現在仍不停在民間傳唱。」賽爾維亞傳統女歌手史芭季奇(Svetlana Spajic)說，她從二十年前就開始在鄉間跟著老學習傳統歌曲，如今已是世界音樂領域中重要的音樂家，並曾與大師級的行為藝術家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合作，「最純粹的傳統裡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必參雜任何現代元素，就能令今日的聽眾感到前衛而震撼。」她說。

一三八九年慘烈的柯索沃戰役，賽爾維亞王國軍隊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全數殲滅後，黃金歲月就此一去不回。只是這場慘敗對賽爾維亞人而言，卻是史詩性的壯舉，代表這個民族為了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站在最前線，對抗來犯的土耳其人異教徒，並犧牲了自己。當年的古戰場，現今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Pristina)近郊，豎立了一座巨大的紀念塔，上面刻著統治者拉扎爾(Lazar)大公在戰役前發出的詛咒：「凡流著賽爾維亞的血的人，若不到科索沃戰場作戰，將永無子嗣……」

這個深埋在歷史底層的誓言從來沒有被遺忘，五百年過去，在南斯拉夫最後歲月的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在同一個地點發表了激昂的演講，用這場飽含恥辱、犧牲、復仇的戰役，號召出強烈的極端民族意識，直接造成往後長達十年的戰爭與動盪。

「這純粹的精神力量被政治狂人濫用來煽動仇恨意識，已成為難以洗脫的汙點，在九〇年代成長的孩子聽到科索沃，永遠是一連串問題，很多人只想揮去這重擔往前走，這很悲哀，不了解自己的根源，怎麼長成枝葉繁茂的樹？」史芭季奇說。她的復活節也是在佩奇教區度過。

●難以和解的法庭

儘管賽爾維亞總統尼科里奇(Tomislav Nikolic)於2013年四月中接受波士尼亞電視台專訪時，破天荒以極低的姿態表示要「跪下來為賽爾維亞人在斯雷布尼查犯下的戰爭罪行致歉」，他仍然拒絕承認那是「種族滅絕」。

「大部分的賽爾維亞人都無法接受將這個沈重的名詞安在我們國家身上。那的確實是令人髮指的恐怖罪行，也的確是賽爾維亞人所為，需要被審判、釐清真相。我們為賽爾維亞人所作

的一切道歉，但並非以國家的名義，因為那完全無法與納粹所為相提並論，後者是整個政府系統性的執行，而前者則是巴爾幹式的『復仇循環』。」符拉迪米爾分析道。

賽爾維亞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國際法庭及背後所代表的歐美政治勢力，直到現在都對賽爾維亞充滿不公與偏見。當年北約部隊在現場袖手旁觀，遲遲不敢介入，無能阻止慘劇發生，為此西方長期感到良心不安，賽爾維亞理所當然成為必須嚴懲的對象。

另一方面，賽爾維亞也積極利用各種機會，在國際上為自己的立場發聲，試圖傳達他們也是受害的一方。聯合國大會本屆主席是來自賽爾維亞的耶利米契(Vuk Jeremic)，四月初時他即利用職權之便在聯合國舉辦論壇，討論國際法庭在處理前南斯拉夫內戰的公正性問題，此舉引來波士尼亞戰爭受害者家屬協會的強烈抗議，美國、加拿大、約旦等國甚至拒絕派代表出席，認為這又是賽爾維亞當局推卸歷史責任的舉動。

「成立國際法庭的目的是要讓正義伸張、仇恨平復，使整個區域能朝和解之路邁進，但目前看來是困難重重。每一方都還是站在自己人的立場，四分之三的賽爾維亞民眾認為ICTY不公正，而克羅埃西亞也認為對他們不公平。」諾威薩(Novi Sad)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畢洛(Miklos Biro)表示。「前南斯拉夫軍備大多掌握在賽爾維亞手中，於是更多犯下戰爭罪行的機會，這也就是為何大多數被起訴的戰犯是賽爾維亞人，完全是機率問題，跟民族性無關。」他補充道。

但無可諱言的，戰後賽爾維亞的名聲一落千丈，「巴爾幹壞男孩」的刻板印象如影隨形。「關於巴爾幹戰爭的唯一真相：所有人都對別人幹下可怕的事，沒有人是純潔無辜的受害者。不巧的是，賽爾維亞人永遠被認為要負最多責任、承擔最多罪惡，我們覺得很無奈也很不公平。但有時這種負面形象也是種優勢，比如到西歐時，人家聽到你是賽爾維亞人，立刻反應就是倒抽一口冷氣悄聲說，『哇，不好惹的來了！』」符拉迪米爾自嘲。

●現實困境

儘管十幾、二十幾年，甚至幾百年都過去了，科索沃及內戰問題卻持續籠罩，整個國家像是困鎖在重重迷霧中走不出來，加上長年以來政客貪腐不斷，經濟情況每況愈下，人們普遍對國家前景抱持悲觀的態度，尤其是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使得賽爾維亞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危機。

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二〇一一年的統計，在一百三十三個受調查統計的國家中，賽爾維亞人才外流比例為舉世第二，只比西非的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好一點。賽爾維亞學生會也在二〇一〇年做過統計，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學生計畫在畢業後永遠離開這個國家。

伊果在從軍前擁有貝爾格勒大學化工系學歷，擔任軍官期間也因表現優異多次被派駐海外，退伍後卻因國內就業市場景氣不佳而長期失業，直到年初才在一間餐廳找到廚師工作，「這無妨，我本來就喜歡做菜。」伊果強顏歡笑地說著。

「我們交的稅和醫療保險有大半都被國家偷走了，除了抱怨，大部分人都很無力。在這裡什麼都要靠關係，專業能力不是重點，有沒有加入政黨、認識有力人物才是關鍵。」伊果的妻子艾莉克斯在社區大學教英語，有一半的朋友都在海外工作，她正準備申請一個美國基金會的補助計畫，希望能赴美進修。

「我算是幸運的，一直在社會科學領域研讀、發表論文，並在半島電視台擔任評論員累積經驗。我一個最好的朋友大學專業是政治學，現在在開卡車。大部分年輕人很難以學以致用，甚至得在咖啡館、餐廳打黑工，沒有任何保障。」符拉狄米爾說。

因為戰爭破壞與共產解體後非法的私有化過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凋零不振，而政府更缺乏長遠的政策規畫，不是把既有的基礎賣給外資，如曾經在南斯拉夫時代生產傳奇Yugo汽車，行銷到歐美的Zastava公司已出售給義大利的飛雅特(FIAT)，就是在等待外資的路上，連最基礎的農業也不例外。

賽爾維亞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是全國土地最肥沃的地區，居然因為缺乏灌溉系統，一到了炎夏作物就死亡，更令人無法置信的是，周遭並不缺乏水源豐沛的河流，這些基礎建設在前南斯拉夫都有，只是在戰爭時被摧毀後就沒再修復。最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表達出投資意願，可能租下伏伊伏丁那的土地發展農業，兼之發展灌溉系統。

●最好的時光

復活節前一天的五月四日，貝爾格勒郊區的一個小山丘上，陸陸續續來了許多的人，充滿虔敬之情，幾乎像是另一種朝聖。

這一天是前南斯拉夫最高領袖鐵托的忌日，他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上滿是鮮花，媽媽帶著身著迷你版共黨游擊隊裝束的小孩、年輕的大學生、老夫老妻，不分年齡階層，從不同的國家來到這裡，悼念這位令人懷念的領袖，悼念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南斯拉夫。

沒有一個人不懷念鐵托，沒有一個人不懷念南斯拉夫。

「想到南斯拉夫，我想到自由。移動的自由。曾經，拿著南斯拉夫護照的我們，幾乎到世界各地都通行無阻。」波士尼亞的女歌手阿米拉說。多麼奇怪！一個極權的共產國家，竟然會和自由畫上等號。

對照南斯拉夫解體後持續將近二十年的戰亂動盪，鐵托時代的繁榮安逸實在很不真實，彷彿屬於另一個世界。就像偶然想起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抬起頭來只是日益艱難的現實世界。

「巴爾幹地區數世紀來累積的仇恨記憶，很難用任何方式化解，只有在南斯拉夫的幾十年期間有短暫的和平。那是個偉大的國家，它的不存在是巨大的遺憾。」符拉狄米爾感嘆地說。

3. 【在衝突之地甦醒】

科索沃北部的城市米特羅維察(Mitrovica)，像深深刺進手指拔不出來的竹屑，為整個地區傳來陣陣刺痛。

這是一座分裂的城市，賽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分居伊巴爾河北南兩岸，老死不相往來。但不像以色列築起高牆隔絕巴勒斯坦人，而是橫跨河上的橋——本當是連結與交流的載體，弔詭地隔離兩個族群。

「你是外國人，走過去沒問題，我是絕對不走的。」菲利浦苦笑著說。今年剛要升大四的他，一生中僅去過河的南岸三次。「我沒有任何阿爾巴尼亞朋友，這邊的一切都和對岸沒有關係。」他補充道。

一排半人高的土堆像戰地工事般擋住橋的入口，若不是菲利浦再三保證，無論如何我都不覺得可以走上去。他口中的「對岸」，是科索沃大部分「國民」：阿爾巴尼亞人的區域，「這邊」則是賽爾維亞人死守的家園。

土牆在三年前築起，而在過去十幾年來，兩岸青少年互扔石頭、各有傷亡的報復性攻擊、各自的巡守隊在橋邊巡邏，阿爾巴尼亞警力甚至一度直接進到北邊來等衝突層出不窮……隔天來到橋邊躊躇徘徊，不久見到有中年人若無其事的從土牆一側走了進去，我跟在後面走上，不久安然無恙的到了另一邊的土堆。

大白天下，像是來到另一個空間，兩個土堆之間安靜異常，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UNMIK)、北約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的軍車與全副武裝士兵像紀念碑一般，佇立在橋中央以及南側。跟基隆河濱公園彩虹橋差不多的距離，是當地人到達不了的彼岸，最遙遠的橋。

一九九九年北約介入，大舉轟炸賽爾維亞，粉碎了米洛塞維奇的「大賽爾維亞」野心，終結科索沃戰爭。之前被賽爾維亞軍隊驅離家園的阿爾巴尼亞人，在美國及北約協助下，最終在二〇〇八年宣布獨立。換成住在科索沃的賽爾維亞人節節敗退，原本居於科索沃的四十萬賽爾維亞人，已有二十六萬被迫離開原本的家園，無數間教堂遭到焚毀破壞。

這只是巴爾幹地區在一九九〇年代內戰以來，循環報復的一個切面，在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等國已慢慢從戰爭的惡夢中平復時，矛盾與對立仍深深牽動科索沃北部的這個小城市。

街上的塗鴉到處都是大大的一三八九字樣與中世紀戰士如天使的身影，當地人以這個賽爾維亞族群心中永遠的痛與驕傲，來宣示死守「自己」土地的決心。

一三八九年慘烈的柯索沃戰役，賽爾維亞王國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殲滅後，賽爾維亞人在科索沃的黃金歲月就此一去不回。之後大量穆斯林與阿爾巴尼亞人移居此地，經過漫長的帝國歲月與南斯拉夫時代，種族與宗教混雜卻融合，但就如同巴爾幹的其他地區，南斯拉夫解體後，國族主義成為籠罩天空的主旋律。

難以想像，超過六世紀的歷史仍鮮活地存在人們的心中，「柯索沃戰役是每個塞爾維亞人的一部分，尤其現在經濟情況很不好，許多年輕人更是從這段歷史中尋求慰藉。」菲利浦說。雖敗猶榮，是我們常聽到也會遇到的情況，可是世界上大概找不出其他民族將這樣的精神推到如此極致。

但是形勢比人強，在出發到巴爾幹前的四月十九日，由歐盟協調的賽爾維亞/科索沃談判在布魯塞爾舉行，並獲得「歷史性」的進展：從二〇〇八年科索沃自行宣布獨立以來，堅決不承認其獨立地位的賽爾維亞，破天荒地接受了許多妥協的條件，試圖步向雙邊關係「正常化」。

可想而知，一切皆是為了加入歐盟。

其中一項重大妥協，就包括米特羅維察的地位。直到現在，它還是直接屬於賽爾維亞，享有中央的補助以及所有與賽爾維亞人等同的保障，雖然我遇到的賽爾維亞人十之八九都覺得政

府很差勁，但無論如何這是心理的歸屬感。因為在新的「布魯塞爾協定」中，米特羅維察即將脫離賽爾維亞，成為科索沃的一部分，由當地塞族人自治。

這裡的人們覺得徹底被出賣了，瞬間明白自己成了歐盟牌桌上的籌碼。雖然可以有自己的行政、警察等管理系統，但他們的中央政府已不是貝爾格勒而是普里什蒂納，「比如法院體系，我們雖然有地方法院，但最高法院卻是阿爾巴尼亞人的，叫我們如何能相信未來的公平公正？」菲利浦說。

「就像你手邊的這隻錄音筆，我說我們來達成協議，我分機器你分電池如何？」科索沃賽爾維亞民族議會發言人尼哥耶維奇(Rade Negojevic)說，對他以及米特羅維察的賽爾維亞人而言，就像自己的東西活生生給別人搶走，是何等的荒謬，不能退讓半步。「賽爾維亞媒體傳達出去的訊息，好像大眾都已接受此協議，無視於我們真正住在這裡居民的聲音，我出生至今從沒見過這等荒謬的事。」在南斯拉夫時代就擔任政治記者，並無懼與共黨高層衝撞的他，對當今媒體昧於「真相」感到十分氣憤。

初抵北邊的城市時，就發現旅館內不時有三三兩兩扛著攝影機等器材的男子進進出出，直到經過一群人簇擁的街道外，經我一問，菲利浦才猛然想起什麼似地說，「我差點忘了，你來的時機真巧，現在首相正在裡面和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座談。因為當地居民都不滿布魯塞爾協定，他試圖來溝通說服。」

聽說昨天還是大太陽，現在淒風苦雨，氣溫降到十度以下，河北邊的城市凝重地傾聽自己的未來，並奮力頑抗。

街道另一頭，人們圍著咖啡館外的電視聚精會神的觀看會談的實況轉播，「你棄我們的同胞、任由我們的兄弟姐妹(在異族人中)流血！」菲利浦為我翻譯著當地政治人物激昂的語言，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在需要的場合，都不吝於展現優異的煽動力。

「老實說，不管我們怎麼不情願，十幾年過去了，這協議對我們已經是最好的時機。它不完美，但我們沒有別的路了。」菲利浦說。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再看到賽爾維亞人重回到科索沃的土地上，我們保證不會報復阿爾巴尼亞人。」尼哥耶維奇說。

在無奈與憤懣之間，在屈服現實與熱血攻心之間，在年輕人與老一輩之間，北米特羅維察像是一座遺落在時間與地理邊緣的城，不安地擺盪著。

覺不覺得這一切對賽爾維亞人很不公平？

「人生本來就是不公平的。」菲利浦淡淡地說。

- 往前掙扎的新國家

當北方的賽爾維亞人不甘地緊抓眼看即將失去的承諾時，這個國家的「主人」，也在重重困難中往前掙扎。

地上大規模鋪設新的磚塊、空中突起新建的樓房、無秩序的車陣中捲起陣陣煙塵……，從外觀上看，科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納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或第三世界的小鎮，但是街上擦肩而過的，卻非破落潦倒的臉孔，反而是一群朝氣蓬勃、精心打扮的年輕人。

科索沃是歐洲最年輕的國家，指的不僅是二〇〇八年才立國的事實，更反映在人口的年齡結構：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在三十歲以下。但它也是整個巴爾幹地區失業率最高的國家，官方統計高達百分之四十，但非官方統計則遠高於此。自前南斯拉夫時期它就是最窮困的地區，至今國內經濟仍主要依賴小型的家庭式企業，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幾乎是全歐洲發展最落後的國家。

雖然其獨立地位已獲得全世界包括台灣的一〇二個國家承認，但諸如俄羅斯、中國、西班牙等有潛在國內分裂問題的國家，至今仍堅拒承認。尤以充滿歷史糾葛的隔鄰賽爾維亞為最，並在實際的層面上處處掣肘。

科索沃至今沒有自己的國碼，必須租用摩納哥的國際碼「三七七」；科索沃的民航機不能飛越賽爾維亞領空，常使得飛行時間更長，票價更貴；五十二公斤以上級世界排名第一的女性柔道好手卡曼蒂(Majlinda Kelmendi)不能代表自己的國家科索沃參加奧運，只能以阿爾巴尼亞的名義參賽，這也是賽爾維亞的干預。

「今年四月在斯洛維尼亞舉辦的東南歐文化部長會議中，我們的部長克拉斯尼奇(Memli Krasniqi)公開呼籲塞爾維亞政府應該歸還一九九九年從科索沃博物館拿走的一千兩百件文物，而在科索沃部長致詞時，賽爾維亞代表就直接離席。」科索沃文化、青年與體育部資政珊蒂(Jehona Shyti)說。「在國際上，我們還是處於孤立的處境，感受到深刻的歧視。」她補充道。

「由罪犯及恐怖分子控制的國度！」這是大部分賽爾維亞人對科索沃的唯一形容。除了政府高官與走私等組織犯罪牽扯不清的相關背景，ICTY前檢察官卡拉·德爾蓬特(Carla Del Ponte)在《獵捕：我和戰犯們》(The Hunt: Me and War criminals)一書中，甚至披露了科索沃解放軍盜賣賽爾維亞俘虜人體器官的疑雲，而包括現任首相哈辛·塔奇(Hasim Thaci)等領導階層，都是當年科索沃解放軍的領袖。

「媒體多喜歡報導衝突，我們呈現出來的形象很不好，多被描繪成貧窮的罪犯，就像你為何來此，而不是去美國或日本。」薩瑪吉利(Enis Xhemajli)邊吃著午餐的三明治，不經意地說，「但我們很年輕，也很努力，有工資便宜的良好勞動力，需要更多來自國外的投資發展。」

這個國家從裡到的一切，都是大量「國外」斧鑿痕跡。薩瑪吉利分別在紐西蘭、英美、比利時等地留學，戰後回來參與重建自己的國家，任職的單位是剛成立五年的外交部，在此之前，所有的政府部門、軍警系統都是在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的託管下運作。

儘管在科索沃獨立後，歐盟已逐步將權利轉移給本地阿爾巴尼亞人的政府，但仍有一支歐盟法治特派團(EULEX)在警政與司法上監督、管理，「我們的角色主要有兩個：一是幫助本地警察建構完整的工作流程，二是處理最具爭議性的司法案件。」EULEX媒體與公共訊息辦公室的詹姆士(James Nicholls)說。目前有三千兩百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警察及司法人員派駐當地。

在這麼龐大的「外力」支持下，有愈來愈多的民眾不滿並擔心國際的介入，使科索沃遲遲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發展的獨立國家，一名為「自決」(Vetëvendosje!)的團體以反對一切國際干

預為訴求，時常號召民眾上街頭抗議，並進入國會占有席次，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民間力量。

- 內戰導火線

太多過去的記憶，讓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擔心。

在前南斯拉夫時期，科索沃雖然不具有屬於六個共和國地位，卻是兩個「自治省」之一(另一個賽爾維亞北部的伏伊伏丁那，直到現在都還維持地治省的地位)。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可以與其他國家簽署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甚至有權力否決中央政府的決策。

「一九八九年以前，科索沃其實已經是個國家了。我們有經驗，不是從一無所有開始。」薩瑪吉利說。只是當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在科索沃古戰場發表完那場著名的演講後，科索沃不但被取消自治省的地位，行政當局並全數被塞爾維亞人取代，官方語言也從阿爾巴尼亞語換成賽爾維亞語。而當時阿爾巴尼亞人占科索沃總人口的百之八十五，賽爾維亞人只占百分之八。阿爾巴尼亞人轉為在私人空間繼續民族教育與組織運作，成為台面下的「國中之國」。

科索沃的少數賽裔與多數阿裔間的矛盾，成為米洛塞維奇操弄極端民族主義開端，並像連鎖反應一般，牽動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不安，在大賽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威脅下紛紛尋求獨立，可說是引爆一九九〇年代內戰的導火線。

但直到九〇年代後半，戰火才真正蔓延到科索沃。而發生在波士尼亞穆斯林身上的種種災難，像是歷史重現般，數十萬阿爾巴尼亞人被賽爾維亞軍隊屠殺、驅趕、流離失所。

「現在人們只注意自己的事，忘記了那段艱苦的日子，這很丟臉。」薩瑪吉利說。在那段賽爾維亞軍隊大舉進城，鄰居不是逃離便是被驅趕的日子裡，他們全家因為曾祖母癱瘓，躲在地下室七十八天，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偷偷出來到其他鄰居家找食物。

「我看到鄰居紛紛從屋裡出來，或許民兵以為整棟公寓都已淨空，沒有入屋內搜索，我們才得以幸運地躲起來。大部分的人必須走到火車站，男女分開，像動物一樣被送上火車，穿過邊界運到馬其頓的難民營，許多人在路上被殺。」薩瑪吉利平靜述說著曾經發生在這座城市的居民身上的事，像是一個遙遠的回憶。

- 無法迴避的遺產

然而關於戰爭的種種其實並不遙遠，它化作堅實的形體留存至今，叫人無法迴避。仍有成千上萬的地雷與未爆彈散布在科索沃，等待被清除。

「有時候甚至就在主要幹道旁！」HALO基金會專案經理貝里夏(Admir Berisha)說。從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這個專門在世界各國清除戰後遺留下來的地雷與未爆彈的國際人道組織，就開始與全世界各地的援助團體在科索沃執行清除工作。

「地雷最密集的区域都集中在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邊界，大多由南斯拉夫政府軍在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之間埋設，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阿爾巴尼亞援助科索沃解放軍，以及從馬其頓進入的北約部隊。」貝里夏解釋。

經過國際聯合組織密集的清除作業，二〇〇一年聯合國宣布科索沃的地雷與未爆彈威脅已降低，當所有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撤走後，卻不幸地發生多起民眾誤觸地雷意外，使得HALO再次回到科索沃，與科索沃安全部隊(KSF)一起合作，朝向「無雷家園」的目標邁進。

除了地雷，會造成大規模破壞、一百多個國家現已明令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彈」，是另一個嚴重的潛在威脅。

一九九九年北約對前南斯拉夫政府軍在科索沃的三百三十三處軍事目標進行持續七十八天的轟炸，共丟下一千三百九十二枚集束炸彈，而這些母彈又釋放出近三十萬枚BLU-97小炸彈，其中約兩成未成功引爆，就此留在人們的花園、耕地、樹林裡。這些未爆彈不只威脅人類生命，更阻斷居民賴以維生的經濟活動，農人無法到田裡耕作、牧人不能到傳統的牧場放牧，孩子更失去在野地裡奔馳的自由。

從以下怵目驚心的數字，可以清楚見到科索沃戰爭為這片土地帶來的「遺產」：

從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一三年三月的統計，HALO共計清除了七十二公頃的雷區、一三〇五公頃的集束炸彈區，銷毀四五一五枚地雷、五〇七五枚集束炸彈，以及二八九四五件對人類生命財產有威脅的軍械零件。

●公民意識崛起

「我們還是不時地想起戰爭，一萬人喪生、三到五千人失蹤、許多婦女被強暴，但愛國意識與民族認同已經轉化為對政府貪腐等議題的不滿，最近一次的大規模街頭抗議已非關塞爾維亞，而是關於服務低落卻不斷漲價的電費。」巴爾幹調查採訪網絡(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科索沃地區總監吉塔·薩拉(Jeta Xharra)說，她曾於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期間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在第一線報導戰地新聞。

她也是科索沃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節目名稱「Jeta ne Kosove」是個雙關語，意為「生活在科索沃」，而她的名字Jeta即為生命、生活之意。節目收視率最高峰是在二〇〇九年全國市長選舉期間，她請候選人上節目辯論政策並說出他們的承諾，兩年後，節目小組再一一到市政府去播放，然後問當選者，這是你兩年前所說的，現在做了多少？當時播出時有五十萬觀眾收看。

「我們有意識地監督基層、草根的政客，若不這樣，當他們持續步向未來的政治生涯，成為中央高層甚至首相，就自然循著過去的陳習。」吉塔·薩拉說。其中司坎德拉(Skenderaj)市長盧西塔庫(Sami Lushtaku)拒絕上節目面對質疑，甚至還攻擊節目小組，並被錄影下來，此段畫面在五月的世界新聞自由日播放後，該市的地方新聞及報紙連續十天在頭版反擊，以「賽爾維亞間諜」、「叛國賊」及其他不堪入目字眼稱呼她。

今年歐盟駐科索沃法制特治團終於審理這件頗富爭議的案件，「我受過無數的恐嚇與威脅，而這個近期的例子是個里程碑，你不能因不同意對方的言論，就任意攻訐栽贓。我們來自共黨傳統，人們總認為政治人物就該高高在上、享有更多權力，但我想傳達出一個訊息，在民主社會，你不能一面想當市長，卻不對人民負責。」吉塔·薩拉以及她的團隊自許要替人民扮演好「看門狗」的角色，監督國家政策並揭露政客弊端。

「在國家爭取自由的道路上，我開始了新聞生涯，親眼見到無數的慘烈戰爭，犧牲了那麼多生命贏得戰爭後，推動科索沃朝向一個能正常運作的國家，是每天早晨醒來，使我前進的力量。」她強調。

雖然這個國家的一切都還在起步階段，媒體卻異乎尋常的充滿活力與衝勁，並不是因為科索沃擁有較高的新聞自由(據自由之家二〇一三年統計，科索沃的新聞自由僅排名全球第九十七)，而是年輕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訊息與意見往往快速藉網路流動散布，使得科索沃的公民意識有崛起之勢，甚至在整個巴爾幹地區相對較強。同時也有經營網路新聞平台的吉塔·薩拉發現，網站的受歡迎程度已日漸超越電視節目。

「從最近的調查發現，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少看電視，沒有受到那些由當權者、資本家掌握的電視頻道，而是從多元管道吸收資訊，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思考。」吉塔·薩拉提到。

儘管年方五歲的國家內部就跟外頭的街道一樣煙塵漫天，處處是興建中的雜亂工地，然而年輕的國民卻仍舊充滿活力地面對生活，與困守在歷史的輝煌與失落的賽爾維亞呈現強烈的對比。

「未來是樂觀的，我們無法沮喪、經濟也沒有衰退，因為科索沃從來沒有更好的過去。」這位名為生活的女士，為她的國家下了充滿希望的註解。